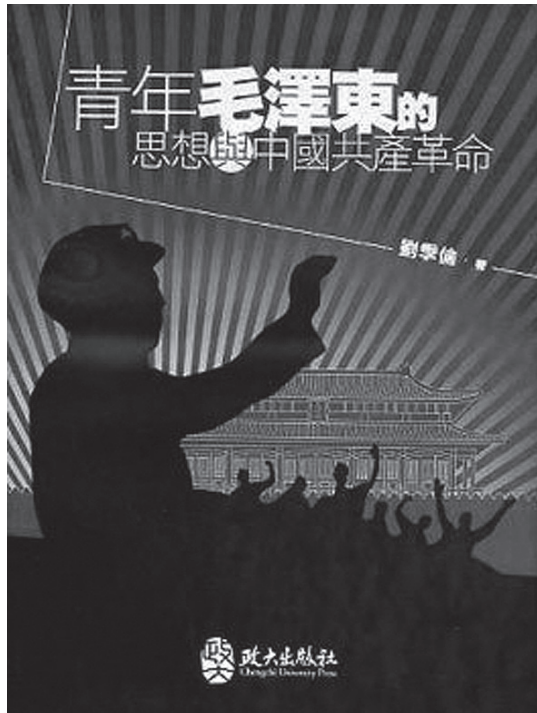


毛澤東與他的時代

劉季倫*



一、革命的溫床

逃不出生活的鎖
避不了吃人的魔
他們走私，我們就是貨
他們坐車，我們就是騾
吃盡了苦，那兒去說
受盡了罪，爲了什麼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逃不出生活的鎖
避不了吃人的魔
他們尋歡，我們只捱餓
他們發財，我們不能活
受盡了累，那兒去躲
犯下了法，爲了什麼

不管是我殺人，還是人殺我
生在這個年頭，總是我的錯
不管是我殺人，還是人殺我
一樣受盡折磨。
還是死了，乾淨得多¹

這首歌反映了那一個時代的精神：階級之間的緊張，埋伏在國共內戰的鬥爭裡。事實上，如果從歷史脈絡來看，這樣的鬥爭，儘管在歷史上無時無之、無地無之，但在彼時彼地，這樣的鬥爭卻越演越烈。而其歷史成因，則必須從當時中國的經濟來看。

伊懋可 (Mark Elvin) 有一段話，言簡意賅地說出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困境：

……由於各種相互連鎖的因素，後期傳統經濟投入產出的關係，陷入幾乎不可能由內在自生的力量加以變革的困境裡。農業生產的每畝平均產量，在當時的技術與投資條件下（因為缺乏工業科技上的投入），都已經達到了極限；而人口成長又穩定地降低了賴以維生的口糧的剩餘。個別人口能夠分配到的剩餘不斷減少，當然就意味著個人除了勉強餬口之外，不再能產生對其他任何商品的有效需求。……

後期傳統中國經濟力，發展到了這樣一個地步：一切有利可圖的科學發明都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農業上不斷降低的生產剩餘，從而不

¹ 這是白光於1949年主演的電影「蕩婦心」中的主題曲〈為了什麼〉。根據網路資料，作曲的是黎平，作詞的是方知。皆不知何許人也。「蕩婦心」是根據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的小說《復活》(Resurrection) 改編的電影。

斷降低的人均收入與人均需求，使得工資越來越廉價，相形之下，資源與資本則變得越來越昂貴。再加上耕作與運輸技術，（倫按：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經好到無法以任何一種簡單的方法來加以改進了；對農民與商人來說，理性的做法，已經不再是發明一套節省勞動力的機械，而是節省資源，並不再增加資本的支出。這樣一個龐大然而又幾乎是靜態的市場，在生產體系中，並不存在一個有待由創造力來加以突破的瓶頸。如果市場上出現了暫時的短缺現象，在當時廉價的運輸系統下，商人的長袖善舞（mercantile versatility），遠比機器發明，能更快、更有效地解決問題。這種處境，不妨稱之為「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²

在當時的條件下，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可能的極限，生態資源的利用也達到了極限，由這兩個極限所供養的人口，更是達到了極限。在這種「高度平衡的陷阱」下，隨著清帝國的崩潰，飢荒、戰爭接踵而來。清末以來，華北某些地方，到了冬天，居民們只能吃一頓飯。³ 在有些農村裡，儘管地主與貧農的財富差距可能並不很大，但這一點差別，在大飢荒來臨時，往往就是生與死的差別。⁴

這樣的歷史條件，正是中國現代史上革命的溫床。一邊是「養生送死之不暇」的飢民，一邊是經營上長袖善舞，在技術上卻已經技窮的富人。白光在 1949 年唱的那首歌中的句子：「他們尋歡，我們只捱餓；他們發財，我們不能活」，必須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看，才能得其確解。這樣的社會條件，像個火藥筒一般，一個火種，就會「火迸金星上九天」，「轟轟崐崐乾坤動」。

中國長期的革命，最後的目標，仍然在於中國的工業化，以求跨過「高度平衡的陷阱」，從而化解引發革命的這些死結。然而也正因為這個「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中國沒有足夠的條件（資源匱乏、技術落後、資本短缺。如

²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12-314. 中文由我自譯。

³ 狄德滿 (R. G. Tiedemann) (著)，崔華杰 (譯)。《華北的暴力與恐慌》(*Violence and Fear in Northern China*)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40。

⁴ 可參看馬俊亞：《被犧牲的局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伊懋可所說的，由於工資太賤，生產成本已經壓低到無可再低，即使引進新技術，也無法再降低成本；所以甚至連開發新技術的動機都消失了）來推動工業化。

二、毛澤東的思想與革命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歷史時空中成長的。

他所謂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不只反映了他個人的氣質秉性，也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氣氛。

毛澤東的思想資源。他從儒家繼承了一套人與天（或曰「自然」）的關係：人是天的「共同的創造者」（co-creator），用中國的古話來說，這叫「參贊化育」、「天生人成」。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大宇宙由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到了今日的時代，正確的認識宇宙與改造宇宙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⁵ 在這段話裡，可以明顯看出毛澤東筆下的人（在這裡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負有認識宇宙與改造宇宙的責任。從宇宙這一方來看，宇宙透過了人，來進行宇宙本身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改造。所以毛澤東可以乾脆說「我即宇宙」。人與宇宙，就此而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但毛澤東從儒家繼承來的，除了這個天人關係的形式外，其內容就大異其趣了。就儒家而言，人受命於天的，是道德上的良知良能。而毛澤東則將這種道德之性，偷梁換柱成了自然之性。這也意味著：在毛澤東身上，見不到在儒者身上常常看得到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看不到那種在天理與人欲間交戰的掙扎與苦痛。這也許是他能夠承受這場極度慘烈、幾無人性的革命鬥爭的內在原因。毛澤東的家人、妻室（楊開慧），在這場革命中都一一犧牲了，他自己也僅以身免。也許毛澤東以上文所述的方式，取消內在的掙扎與苦痛；對他自己而言，這是一種幸運。

天人關係的形式來自於儒家，而其內容則與儒家大異其趣。所以我說毛澤東的思想是傳統儒家的「變格」，它與儒家貌合神離，似是而非。

⁵ 毛澤東：〈真理與實踐〉，收入姜義華編：《毛澤東著作選》（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頁118、120、124。

在毛澤東的思想（按：這裡有必要提提我一位評論人銳利的觀察：毛澤東的思想，與中共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不見得是同一回事）裡，要實現「我即宇宙」乃至於「己即神也」，就必須把他的「小我」不斷擴大。不斷包羅外在的異己，使異己變成「小我」的一部分，寢假而將「小我」擴大成「大我」。一切在「我」之外的異己，都等待著這個「大我」的包羅。「小我」包羅萬有的過程，一般而言，可以軟硬兼施：既可以利用革命宣傳，也可以利用革命戰爭。如果有朝一日，這個「小我」擴大到至大無外，擴大到與宇宙同體，那也就是「大我」完成之日，是「我即宇宙」、「己即神也」實現的那一刻。

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中國的共產革命，就是他的「小我」擴張而成「大我」的過程。他的主體性，經由這個過程，也跟著轉嫁給了所有由他的「大我」包羅起來的萬人萬事萬物。他是萬人萬事萬物的領銜者，他也是萬人萬事萬物的擔綱者。借用 Thomas Hobbes (1588-1679) 的比喻，他是中國版的巨靈 (Leviathan)。

鑑於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許多農民還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一盤散沙（我的書上談到了一件取自於《沈從文自傳》中的故實：沈從文親眼看到一批農民們，任人宰殺，毫不反抗，以供人冒功領賞），毛澤東將他自己的主體性，賦與了這些農民。也許這是這些農民們能夠在當時展現主體性的唯一辦法了。

到了「大我」實現的那一刻，毛澤東的「大我」之內的眾生，就可以「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了。革命不是為了遵循常規，而是為了打破常規。

然而，就在這裡，也隱藏著毛澤東的思想中一個與之俱生，與之俱存的矛盾。

毛澤東的「小我」不斷擴張的動力，如他自言，是「自由之意力」（現在一般用的詞彙是「自由意志」）。毛澤東的「自由之意力」，當其擴張時，在與其相鄰的「阻回者」身上，感受到了阻力，也在感受到阻力的同時，利用這種阻力，體驗到了自己的力量。毛澤東的「小我」之擴張，就在與直接相鄰的「阻回者」不斷的交戰中進行，在與「阻回者」的相抗中奏凱，並經由吞噬「阻回者」而完成。

「自由之意力」的存在，是必須在與「阻回者」的對立關係中，才有意義



的。換言之，如果沒有「阻回者」的存在，也就沒有了「自由之意力」與「阻回者」的對峙。這種對峙的關係，規定了彼此的互為條件：「阻回者」之存在，正是「自由之意力」之存在的必要條件；反之亦然。「自由之意力」的存在，必須依賴最起碼的「阻回者」之存在。

換言之，當毛澤東的「大我」併吞了一切的「阻回者」，從而發展得至大無外時，也就是它本身的末日；因為不再有最低限度的「阻回者」存在，以托襯「大我」的「自由之意力」了。「大我」的凱歌，正是它自己的輓歌。它的步步勝利，鋪成了它自己的滅亡之路。它併吞了「阻回者」，從而也取消了自己。

這是毛澤東的思想的悲劇性命運：必須不斷找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對象，這個「自由之意力」，才有用武之地。而每一場勝仗，由於又進一步取消了「阻回者」，取消了自己賴以存在的條件，所以也就更進一步地逼近了自己的末日。於是只有再去尋找新的「阻回者」。最後，在革命打開的廣漠曠野中，它如果找不到下一個敵人，找不到下一個「阻回者」，它就只有面對著自己的末路。

這在中國現代史的現實上就意味著：應著革命的運而興起的毛澤東的思想，在鍛鍊自己成為革命的利器以後（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無法結束它捲入乃至促進的這場革命。

革命的敵人，證明了革命的必要；而消滅了革命的敵人，也就意味著取消了革命的必要性。必須不斷地餵養以革命的敵人，革命才能繼續壯大下去；有朝一日，當革命的敵人消失在地平線上，革命也只好走向末路。革命者與革命的敵人，因此而有了共生的關係：在一種永劫的對峙中，革命者利用革命的敵人的存在，以維持自己的存在……。為了革命長存，革命必須不斷尋找新的敵人。這是個迴旋不已的革命的漩渦。

三、革命「高度平衡的陷阱」

依郭益耀的研究，從中共建政以後，「制度制衡」與「技藝制衡」的交互作用，終於打破了中國「靠天吃飯」的歷史格局。⁶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很確

⁶ 郭益耀：〈「靠天吃飯」的歷史格局又如何打破？〉，收入氏著：《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頁 181-191。

定地說：伊懋可所謂的「高度平衡的陷阱」，確實已經在這場革命後打破了。

在工業方面，郭益耀指出：「毛時代經年累月地優先集中投資於重工業，尤其是鋼鐵與機械工業的建設。有了這兩門基礎工業，以及其他如化工等配套部門，也才能發展出自己的輕工業。所以到了 1978 年時，……中國的 GDP 已經將近一半是由工業部門所創造的（相對於 1952 年草創之初的五分之一）；這澈底地改變了歷史上向來以農業為主的國民經濟結構。這一極為高速的工業化過程，前後不到三十年，是西方工業強國花了一兩百年以上，以輕工業為出發點的努力才能完成的」。「毛的這套『鐵血』建設戰略卻令中國擺脫了『靠天吃飯』和長期貧困，或曰發展經濟學所稱的『低程度平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歷史格局。毛的這一功績，肯定不比十九世紀統一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遜色」。⁷

這是一位經濟學家的看法，是耶非耶，自然言人人殊。

這場革命的代價極為鉅大。而其成就，似也不容否認。

然而，不論我們如何理解這場革命，不論我們如何理解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條件與人類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大概都無法否認毛澤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福兮禍兮，知毛罪毛，也都不是能夠輕易作出的判決。

在中國革命恩怨未盡的目前，妄想回答這些問題，而不致引起爭論，是不太可能的。我試著從一個片面，思索這些問題，期待能走出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小步。任意信筆，言無忌諱，與人所見，未必盡合。知我罪我，不復能顧。

——2015 年 3 月 6 日深夜

⁷ 郭益耀：《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頁 8、28。